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朗宇法师 主编

经典诠释与中国佛学

杨维中 著

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主编 朗宇法师

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

经典诠释
与中国佛学

杨维中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典诠释与中国佛学/杨维中著 . 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6

(宝庆讲寺丛书,中国佛教学者文集/朗宇法师主编)

ISBN 7 - 80123 - 771 - 4

I. 经… II. 杨… III. 佛教 - 文集 IV. B948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067693 号

经典诠释与中国佛学

杨维中 著

出版发行：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：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0(编辑部)

责任编辑：戴晨京

版式设计：陶 静

印 刷：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5 印张 410 千字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000

书 号：ISBN 7 - 80123 - 771 - 4/B·355

定 价：42.00 元



总

序

从佛法本身来说，教、理、行、证的修学次第，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。但是，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、喜好的不同，往往有所偏向，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，有重义理、重实践等区别。但是，作为佛弟子来说，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，充分、完整地表达出来，如“阿毗达磨”虽然着重于论证“法”的自性、定义、关系等，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“谛理的现观”，最终归于修证。那么，重修证的佛教，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，重视佛法的适应性、实效性，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，如初期大乘经典以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、“解脱门”、“陀罗尼”、“菩提心”等作为中心，来表达从发趣、修行、证入的历程。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，但都是佛法的根本，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。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，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，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。《高僧传》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，其中翻译、解义、读诵便属于义解门；而习禅、明律、感通、遗身、护法、兴福，都是属于实践门；最后一科“杂科”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，旁及世间经



书、治世语言、礼乐文章等，无不兼通。

但是，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，主要是注疏经、律、论，在“述而不作”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，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。而且，这些佛教义解僧，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，通过注疏、论著，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。南北朝佛教的兴盛、隋唐佛教的辉煌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，重视主体的体认、自己身心的解脱、净土法门的流行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，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随着禅、净的流行，在这种“简单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潮流下，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、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。于是，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。

另一方面，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，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，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，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。于是，通过接触梵文、巴利文等东方语言，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，消化佛教的教义。在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主义”思想的影响下，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、纯学术性，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，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——佛学。19世纪后期，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，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。随着“西学东渐”、日本佛教对



总
序

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,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,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,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的辨伪,“大乘佛教非佛说”的讨论,“佛教非宗教非哲学”之辩等。同时,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,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“人生佛教”运动,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,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。但是,相对来说,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,像吕澂、陈垣、汤用彤等,皆为一代学术大师。

改革开放后,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经过二十年的努力,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、重塑佛像的工作,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、香火旺盛的现象。于是,培养人才、弘法、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。然而,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,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。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,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,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,文献学、考据学、思想史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,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,定性定量,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。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,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,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,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



法,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,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,显示其优胜之处。通过学术研究,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,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。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,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,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;同时,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,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,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。

因此,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,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,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、文物中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探索其前后延续,彼此关联的因果性;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,及其因时、因地的适应。以了解过去,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,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“人间佛教”思想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“以文化阐扬佛法,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、本土化、现代化的权巧方便。”现代中国佛教界,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,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,通过转化与变通,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,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。

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(989),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嘉定十五年(1222)宋宁宗赐名“宝庆讲寺”。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、尊重



总序

学术、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，一直讲法不辍。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，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《宝庆讲寺记》。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《宝庆寺观音殿记》。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，高高地耸立在寺里。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，在日常事务、早晚功课、坐禅念佛等之外，勤于读书，研究经论。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，参访名山大寺，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，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。因此无论到哪里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，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，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，已经蔚为大观，感到欣慰。但是，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，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，而且现有书籍之中，难免良莠不齐，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。有感于此，我和道坚法师、圣凯法师、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，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。于是，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，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，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，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。

朗 宇

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

目 录



总 序 朗 宇 (1)

目
录

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	(1)
法显与《佛国记》	(31)
论《楞严经》的真伪之争、佛学思想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	(66)
《华严经》的形成、汉译、基本思想及其修行论意义	(99)
《华严经·入法界品》的思想内容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	(129)
论《华严经·十地品》的佛学思想及其对中国佛学的影响	(194)
“六家七宗”新论	(299)
论中国佛教的“心”、“性”概念与“心性”	1



问题”	(311)
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四种范式及其 比较	(326)
从诠释学方法看儒、道对佛教心性思想的 影响	(353)
四祖道信大师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 校释导言	(367)
论新罗顺之禅师对沩仰禅法的发展	(373)
杨岐方会的禅学思想及其门下弟子	(387)
以《宗镜录》为例论永明延寿对唯识思想 的摄取	(399)
近代佛学巨擘范古农的生平及其佛学 思想论略	(426)
“与时俱进”与“契理契机”:中国佛教教团 制度的现代化之路	(452)
近代中国对传统佛教的反思与日本的“批判 佛教”驳议	(528)
后 记	(546)

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

——《法门惠恭大德之碑》考释



关于法门寺，当代学者康寄遥在《陕西佛寺纪略》中言：“西安附近各祖宝塔，对于法门寺塔，犹如众星之拱北辰。”何以言之？因为此中有如来真身舍利。由于法门寺独与佛骨相连，因此使之成为超越所有佛寺的佛教圣地。有唐一代，更是掀起了奉迎佛骨的狂潮，1987年，法门寺塔下地宫文物的出土，引起了世人的注目。这批文物中，有一方残碑，名《法门惠恭大德之碑》，碑文已发表三次^①，然均因录文及句读失误颇多，未能引起学界注意。近来重读碑文，发现惠恭乃是一位三阶教僧人。三阶教命运多舛，历遭禁断，经典、史籍存世者几稀，故此碑当有一定的学术价值，或当有补于我们认识唐初三阶教的传播情形和思想变化。兹将碑文重录并断句于后，进而试为阐释惠恭大德行历及其佛学思想。

^① 分别见于陈景富著《法门寺史略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9年版；韩金科、王均显撰《新发现唐法门寺住持〈惠恭禅师大德之碑〉》，《文博》（西安），1991年第4期；李发良著《法门寺志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4年版。



此碑本镶于法门寺塔基地宫之石壁中，出土时已断为数截。经拼对，此碑残高约 1.60 米，残宽 0.64 米，厚 0.23 米。碑首篆额两行，字有残损，每行现有三字：“□门惠恭△□德之碑”。碑文正书间有行体，残存 30 行，满行 54 字。碑阴铭刻《佛遗教经》，经校对知其为鸠摩罗什译本。现将重新整理的碑文录载于后，“△”符号表示其行隔，意补的字加〔〕表示：

[法]门惠恭[大]德之碑

(前缺五十字)为如来下△(缺 43 字)者也。法门寺者，本名阿育王△[寺]。(缺 14 字)初生魔焰，正□百年，斯主出代，用人□□□□。羸正指位，□天子之□癸，乃人同臣历造生地狱诽谤△(缺 11 字)仍起心花于镬汤，恶王归依，清业林于信圃。遂发愿营塔，遍四天下，精心入道，释梵光，其福田至感精微，鬼神尽△(缺 9 字)神光夜明，八万四千，不日而就。其寺则育王之一所也，因而为号。惠恭禅师之上居焉。

禅师俗姓韦氏，本鲁国邹人。其△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邑天祚归商，以豕韦称霸，盖得姓于其国，因而命氏。禅师虚而保真，清而容物，感阴阳之粹气，得天地之淳风，思越断常△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不染嚣尘，髫龄之年已堕僧数。岂非善吉罗汉自罄家资，玄鹏比丘先摧论鼓。年甫



十四，依慈门寺道场审禅师听受三△[阶][佛][法]，
□□□□句，心远七憎，以果收因，则含生皆佛；将时
验质，则以位独凡。上根下根，洞悟其旨，真学妄学，
究竟其门。苦行精诚，年逾十载。
△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禅师者，佛法之机衡，幽途之炬
烛。心滋有待，智入无端，名称普闻，众所知识。禅
师稽首接足，亲承问道，摄念归依，习禅三△[载]。
□□□□□□□会真空。虽业利已修，化迷入悟，禅
师慈愍有待，将击群蒙，乃阴照昏山，明发心海，解体
三昧，利周四衢。年廿三，还居此寺。
△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花，戒珠圆明，能清五浊之
水。上士稽首，中庸归命，意消神悟，目击道存。以
为定慧不兼，静乱殊学，遵行五众，虔奉四依。
△□□□□□□□杨之□。惠日明代，非开寂灭之
域，遂别安禅院，清净住持，夙夜翘诚，供养灵塔。贞
观之末，沐浴舍利。便烧二指，发菩提心。即
△□□□□□□□，清净大众，宛如初会。倏睹尊
仪，情如新灭。岂止灵光浮景，空惊迦叶之心；宝相
澄辉，似入闍王之梦。^① △

□□□□□之道，行戒言之放心^②。△天皇
□□，□□地络，克振天维，安上□□，定礼制乐。以
为垂衣端拱，得尊之于此方；御升乘乾，非超之于彼
岸。悬般若之镜，圆照十方；燃涅槃△之香，上
□□□，□报先于施作；旷劫之强，缘道始于檀为。

① 此行未满。

② 此行未满。



大千之化主，显庆首年施绢三千匹，修营塔庙^①，△敕师结□□讫冥，因假愿力以庄严，若神功之再运；感灵仪而示现，如轮王之重修。禅师清净其心，深信坚固，集众法宝，如海导师。尝与胜光△寺惠乘[法] [师]同德比义，赠禅师行塘布巾，表为善友。则知舍利、迦叶更为显扬，文殊、普贤乐相诚仰。俄而乘师下代，德音绵邈，道林存化，虔之△独存。长□□煜，耻为孤照昏衢，智眼恨不兼明，悔叹业像奔驰，将沦教戒；爱马腾跃，先亡苦空。故勒石题经，昭其未悟。敬镌《遗教经》、《般若心经》△各一部。□□□道，我执断灭，明性起于禅枝；法空见前，引尸罗于智果。顿渐宗印，终始住持。寂静律仪，则睹文齐相；澄清等忍，则观义忘言。故△知；道存□□，□执油于副墨；理归微渐，见法雨于临墀；四果声闻，感无涯而丧偶；十方菩萨，睹即色而归心。宁止香艳，成云发东方之紫气；花△缨结雾，□□□之青光而已哉！当愿：定镜流辉，尘清四念；心珠凝彩，照引三明；芥城几空，海印无底；河神屡顾，法母常安。弟子学谢文圆，才非△武库，有□□□，期种觉于雷阴；未获归依，冀前缘于智胜；德山高远，思三昧于瞻□；定域幽深，心不及于疑始。希为善诱，敢作铭曰：^② △

识海波□，□□扇激。非我法王，谁救沉溺。般若实性，尸罗妙迹。化城屡迁，真空不□。其一。

十方诸佛，从法立名。相有始终，心无坏成。惠空七觉△，境智□□，□□度者，实无众生。其二。

① 此行未满。

② 此行未满。



世间实有，名为一合。智越断常，心超间塔。种觉□映，一多相纳。怨形妄心，显见灵塔。其三。

正像既迁，二阶△无实。□□□□，四依挺出，了别爱憎，弘扬诫律。重振法鼓，再明佛日。其四。

心相不〔二〕，国土皆空，虽舍觉性，不废愚蒙。始明惠炬，终扬戒风。希除△妄识，□□□□。其五。

碑若天工，字凝神运。密严显迹，含性招训。降伏四魔，归依百部。定水澄影，迷津息问。其六。

佛前佛后，劫尽劫生。^① 尘界虽暗，法△眼恒□。□□□果，包含色声。惠空无际，福尽有情。

永昌元年岁次乙丑□月庚戌朔卅日己卯

法门寺僧惠恭树

郭□□一心供养

二、惠恭禅师生平考证

法门寺惠恭之名，不见于现存僧传。出土之碑亦未载其生卒年份。然而，据碑载惠恭禅师“年廿三，还居此寺”及“贞观之末，沐浴舍利”推断，其于贞观二十一年前当已至法门寺。另外，从其在贞观年间于法门寺的弘法成效看，至少需近十年方可成就，故由此可再行将其至法门寺的年限上推约十年。这可作为其下限。参之于其它证据，惠恭住在法门寺肯定不会早于贞观五年（631年）。原因有二：一是法门寺本身的情形；二是碑文中提到的惠乘法师之行历。

^① 此行55字，“生”字乃添加小字。



法门寺，隋之前名阿育王寺，隋代名为成实寺。唐武德元年(618年)唐高祖李渊在称帝前数日于隋大丞相任上，下令改之为法门寺。不过，贞观五年前的法门寺仍呈败落之状，于关中佛教影响有限。据道宣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记载：“及周灭法，廈宇外级，唯有两堂独存。”^①“大业末年四方贼起，诸乡在平原上，无以自安。乃共筑此城，以防外寇。唐初杂住，未得出居，延火焚之，一切都尽。二堂余烬，樵黑尚存。贞观五年，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，来寺礼拜，但见古基曾无上覆，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，下诏许之。”^②因构塔上尊严相显。张亮又报请太宗批准，将塔基下佛骨请出以示众，引起包括京师长安在内的周边僧俗的普遍信奉，“无数千人一时同观”^③，场面颇为盛大。由此，法门寺于关中塔庙中脱颖而出，声名远播。惠恭禅师可能是因此缘由而移住法门寺的。

此碑又载，惠恭禅师“尝与胜光寺惠乘法师同德比义，赠禅师行塘布巾，表为善友”，“俄而乘师下代”云云。惠乘也作“慧乘”，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四有传，其文曰：

释慧乘，俗姓刘氏，徐州彭城人也。……叔祖智强，少出家；陈，任广陵大僧正，善闲《成论》及《大涅槃》。乘年十二，发心入道，仍事强为师，服膺论席。……大业六年，有敕郡别简三大德入东都，于四方馆仁王行道，别敕乘为大讲主。……武德四年……乘等五人敕住京室。于时乘从伪郑词被牵连。主上素承风问，偏所顾属，特蒙慰抚，命住胜光。^④

-
- ① 唐道宣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52卷，第406页中。
② 唐道宣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52卷，第406页下。
③ 唐道宣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52卷，第406页下。
④ 唐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25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633中-634页上。



惠乘时为隋唐间一义学名僧，备受僧俗尊崇。武德八年（625年）高祖幸国学释奠，时众推惠乘为导首讲经。正如道宣评曰：“身历三朝，政移六帝，频升中殿。面对天颜，神气箫散，映彻墙仞。自见英德，莫不推焉。”^①能得此前辈僧的赏识，对于年轻的惠恭极为难得，故碑文用“舍利、迦叶更为显扬，文殊、普贤乐相诚仰”来类比他们之间的友谊。贞观四年（630年）十月惠乘师于胜光寺圆寂，春秋七十六。胜光寺位于京师长安西南隅，离惠恭求法所在的慈门寺很近。从行文的语气考虑，于惠乘之交往当是惠恭仍滞留于长安时的事情，这是贞观五年后惠恭方至法门寺的可靠论据。

如以上推论不谬，那么，惠恭生年可以暂定为隋大业四年（608年）至唐武德元年（618年）之间。此碑立于永昌元年（689年），时惠恭禅师仍然健在。

惠恭弘法行历大要有六：其一早年依师；其二移住法门寺；其三建三阶禅院；其四祈请舍利；其五修塔迎奉佛骨；其六刻经立碑。

据碑文，惠恭大德俗姓韦氏，“髫龄之年，已堕僧数。”髫龄，即童年，一般为五岁至十岁之间。“年甫十四，依慈门寺道场审禅师听受三□□□”。慈门寺位于长安南门之西，是“隋开皇六年刑部尚书万安公李圆通所立”^②。开皇九年（589年）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及其弟子僧邕等因隋文帝之召请入京师传教，左仆射齐国公高颖“邀延住真寂寺，立院处之”^③。后信行“于京师置寺五所，即化度（即真寂寺）、光明、慈门、慧日、弘善

① 唐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25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634页下。

② 宋宋敏求《长安志》卷10，《宋元方志丛刊》第1册，第125页，中华书局版。

③ 唐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16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560页上。